

赤门谈史录

刘大年



赤门谈史录

论辛亥革命的性质

刘大年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马少展

赤 门 谈 史 录

——论辛亥革命的性质

刘 大 年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125 印张 128,000 字

1981 年 7 月第 1 版 198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800

书号 11001·451 定价 0.68 元

说 明

一、《赤门谈史录》是我在日本东京大学研究院讲中国近代史的一束讲稿。东京大学校门叫“赤门”，“谈史录”不用解释。缀合二者作为书名，取其简单明了。

二、讲稿的主要部分是《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头一次和末尾一次讲课，曾分别解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等问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与指导思想问题》，就是由那些解说组成的。东京中国研究所、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地的朋友，要我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情况，又临时草成《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一稿。它们有的在刊物上发表过，这次印行，略有增改。《横滨、东京孙中山遗迹访问记》等三篇，或者与讲题有关，或者当时同日本学者有所讨论，附录在后面，用资查考。

三、东京大学前任校长加藤一郎、现任校长向坊隆两位先生倡议邀请中国学者讲学，做了不少工作。我去讲近代史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研究院中国史专业的青年朋友和有关的教授近三十人，在三个月时间里，参加切磋讲求，始终不厌不懈，令人难忘。请让我把这本小书献给研究院的青年朋友和所有关心中日学术文化交流、中日友好的朋友们。

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何重仁、王来

棣、邹念兹、沈自敏同志，先后为撰拟《论辛亥革命的性质》提供资料；邹念兹同志并翻译所用全部日文材料；齐肇业同志帮助清缮稿件、核对引文、整理注释。谨此致谢。

刘 大 年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目 录

说 明	1
-----------	---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与指导思想问题	1
---------------------------	---

论辛亥革命的性质	22
----------------	----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	122
------------------	-----

· 附 录 ·

承先启后 责无旁贷	136
-----------------	-----

——祝中国史学会重建

王芸生先生和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41
---------------------------	-----

横滨、东京孙中山遗迹访问记	146
---------------------	-----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与指导思想问题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国有句成语：“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盲瞽不行，陆沉，闭目塞听，不识世务，更加危险。我们重视近代史研究，就有反对“陆沉”的意思在里面。

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下一百一十年。它的内容是什么？照毛泽东同志简明的归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的革命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①。一百一十年中，又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前面划归旧民主主义，后面划归新民主主义。所以我们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指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或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历史。外国资产阶级与中国地主阶级、中国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分别坚持自己的要求和

^① 《毛泽东选集》1964年版，合订本第673、626页。

利益，鲜明表现出各自的性格，斗争激烈，规模空前巨大。阶级关系变幻、复杂。凡此一切，都为世界历史上所罕见。并且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又是近代东方矛盾的集中点。中国所进行的斗争，所发生的变革，深深地牵连东方世界，也广泛牵连、影响西方世界。中国近代史名副其实是东方和世界近代史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事实就是如此，但是我们怎样看待研究这段历史的现实意义呢？

历史总要这样那样与现实发生联系。历史如果与人们的生活、斗争无关，那它早就不为人所注意，以至早就不成其为一门学问而存在于世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特点，是它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更加直接。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许多问题是昨天的继续。某些事情所以是现在的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都有其历史的根据和原因。那些根据和原因，显然不能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去寻找，而只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寻找。总结前人斗争的经验，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今天我们要着重总结的也是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等等的经验。这一些，都说明近代史研究有明显的现实意义，然而这一些，还没有包括最重要的意义。

近代中国一百一十年间接连兴起的阶级斗争和它所达到的最后结局，向我们明白指出了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意义是什么。最近听到日本学者讲：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日本活跃起来，是中国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一部分人研究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另一部分人研究明清史，目的都是一个，希望了解中国何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结论如何，可能各有不同。但是大家必定共同发现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西方一些资格最

老、发达最充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了二、三百年，至今仍然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的桎梏。中国在短短的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迅速跨过资产阶级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那是怎么发生的呢？实在太奇怪了！回顾一下，我们可以知道，一部中国近代史最权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两个革命时期合在一起，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三个前途，三种命运，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要求必须作出选择。第一个前途，第一种命运，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变为殖民地。外国资产阶级拚命驱使中国走向这个前途，选择这种命运。他们一次又一次发动侵略，并与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相结合，统治我们的人民，发号施令。中国部分地区被暂时变成了殖民地。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不甘接受这种命运。外国侵略者所指望的中国全部殖民地化的前途，由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的顽强的革命斗争所阻止了，到底没有实现。第二个前途，第二种命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压迫，变中国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农民阶级为实现这个前途，取得这种命运，先后发起过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两次重大斗争。农民阶级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创始者，但它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主力军。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编》最引人注意。他们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并且提出了模仿资本主义的设想。义和团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的要求，它号召“灭洋”，把帝国主义统统驱逐出中国。但农民阶级的两次重大斗争都被帝国主义绞杀了。资产阶级为着实现这第二个前途，取得这第二种命运，先后发起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两次重大斗争。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希望用自上而下的变法改良来使中国资本主义化。经过短短的一百天，就在顽固守旧派的反击下宣告流血破产了。辛

亥革命的领导人、参加者，深信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国是正义的，是中国的出路所在。他们之中许多人为此抛头颅，洒热血，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在中国，建立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证明，那条路是走不通了。第三个前途，第三种命运，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斗争，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前途，争取这种命运。帝国主义始终坚持反对中国走这个前途，但没有能够得逞；地主阶级始终反对，也没有能够得逞；买办阶级坚持反对，也没有能够得逞；它们联合起来，群起反对，尽了一切努力，最后都终于没有得逞。无产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前途起了决定作用，那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它的作用只有得到全国人民的赞成，只有符合历史前进的要求，才能发挥出来，否则根本不会成功，这更是毫无疑义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获得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历史对一百一十年大搏斗所作的最后裁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转变为社会主义，中国重新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历史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我们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历史，必然地、无可避免地要得出这个结论。某些人仿佛以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阶段，不过是一种偶然性，是无缘无故而来，或者是轻而易举出现的；似乎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发生动摇。那种看法，不但是完全不懂得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前进的客观规律性，而且也是对近代中国的历史懵然无知。研究中国近代史，让人们懂得中国走进社会主义怎样体现了历史的裁决，人民的选择，这个现实意义还不明显、不重大吗？

某事重要，某事次要，总是比较而言。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制度经受过急风骤雨斗争的严峻考验，在中国站稳了脚跟。研

究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有现实意义，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得到历史的证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三十年里，我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昭昭在人耳目。那些抱着片面观点，抱着敌视态度的人，可以说中国存在一百条、一千点缺点。但是我们举出一条优点，就足以压倒那一百条，一千条：我们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中国基本上实现了。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目前我国的生产仍旧落后，新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起来了，也才算粗具规模。从根本上说，这是历史造成的。中国既然进入了社会主义，我们也就必定要在这个制度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并且最终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就象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中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一样，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我们取得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胜利。第二，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诞生的时间很短，在中国刚满三十年。它的发展、前进规律人们并不熟悉。不能说我们一切都认识了，一切都很正确。恩格斯说：“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象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末，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①。对社会主义制度中许多问题的认识当然也是这样。民主革命的胜利，是由于我们认清了自己的“国情”，采取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地也必须认清自己的“国情”，采取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路线、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1年版，第20卷，第99页。

方针、政策，才能胜利前进。何况我们的“国情”里面总存留一些陈旧、腐朽的东西。官僚主义痼疾就是其中的一种。其他缺点、错误也并不稀奇。我们要坚持“两点论”，不愿成为“一点论”，想要按照辩证法办事，不愿意成为形而上学家，就应当正视事物的这一方面。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知道以前走了弯路，将可以使今后少走弯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对于阐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分析、总结人们对它的认识的不完善性，改进工作中的错误、缺点，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主张重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但是应该更重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研究。其他领域的研究自然也要注意，不要割断历史。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无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都离不开一定的指导思想。十六世纪著名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学说的信奉者第谷·布拉赫，由于观测准确，对天文学贡献很大。他的名言：没有一个关于世界体系的理论指导，就无法进行观测。爱因斯坦在他的《自传》一开头，就表白了自己的“认识论信条”。爱因斯坦说，“科学若没有认识论——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就是原始的，迷惘而纷乱的”。历史学同样如此。它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就像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天文学、生物学的巨大功劳一样，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使历史研究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我们主张研究中国近代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道理就在这里。

常常有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者信奉抽象历史公式，并把那些公式视为绝对不变的教条。例如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家就说：

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并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中国一位专门研究太平天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批评所谓“左派史观”说：“左派所信奉者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及由此基本哲学概念而产出的经济定命论、经济史观、或唯物史观，以阶级斗争为社会进化之法则，以经济物质为人类历史之中心。这是他们狂迷信奉的、盲目接受的，而视为亘古不变的绝对教条。凡诠释历史——无论属于哪一国家或哪一时代的——都运用演绎的、反科学的方法，实施这先天的、抽象的教条为前提。如其不符事实，预言不中，解释不对，就不惮掩饰史实，歪曲史实，甚或迫要改编史事，伪造史实——总之其方式是不顾史实如何，务期证明那教条之为正确不磨的真理。”^①这类歪曲和攻击，说明一些资产阶级著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充满着偏见和憎恨，而又无力从实质上加以反驳。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任何人要非难马克思主义，就应当驳倒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论点，或者主要的东西。如果有，那就是重复陈旧的唯心主义、宗教和神学宣传。反对者攻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里的所谓“抽象的历史公式”、“万古不变的绝对教条”，自然首先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五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学说，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他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缜密、最深刻的研究，凭借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证实了这个结论。今天回过头来看，马克思这个学说，早已不再是十九世纪天才的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一种理论。世界千百万工人、革命群众一直在运用这个学说同资本

^①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绪言。

主义作斗争。地球上广大地区里出现了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十九世纪天才人物的科学思想如今已经变为现实。因此，资本主义的衰亡，社会主义的出现，这根本不是一个值得赞同与否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矗立在世界上的客观现实。阶级划分、阶级斗争的学说也是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阶级作过阶级分析。马克思所加入的东西，据他自己说，是证明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这个政权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现在世界上并立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它们既是一定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表现，又是那种斗争的结局。因此，阶级划分、阶级斗争同样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私有制社会里普遍地存在、经常地发生的基本事实。资产阶级没落的社会历史学说，一面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采取“不承认主义”，一面又拚命从事阶级斗争宣传。就象列宁所说：“阶级斗争的学说这个东西，是还会有人妄图从学术上（所谓学术上）来反对它的。但是，只要从实际上提出问题，看一看日常的现象，那末（看吧！）就连这个学说的最疯狂的反对者，都会象萨克森的法官金斯堡先生这样，成为阶级斗争的天才的宣传者”^①。资产阶级的著作家不敢正视成为马克思主义建筑基础的全部事实，而只是把它歪曲为所谓“抽象历史公式”、“绝对教条”，施加攻击，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它从反面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是驳不倒的。

常常再有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或起码不能算做精密的科学。科学这个概念要反映一定的内

^① 列宁：《国际法官代表大会》，《列宁全集》1959年版，第18卷，第298页。

容。物理、化学、生物学等，都极其精密，演变自有规律，可以测知未来。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既不能实验，又没有精确数据。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著作，对许多问题，经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同一问题，同一作者，今天这么说，明天又相反，不但毫无精密可言，有时还黑白颠倒。它怎么能够同自然科学相比，成为一门科学呢？

其实马克思主义著作上从来也没有说过，似乎历史研究与物理、生物等科学属于同类性质。倒是相反，马克思主义指出，搬运自然科学，例如搬运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历史，那是达尔文学说的庸俗化，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只能逐步完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这点上并无不同。自然科学史上许多问题，一段时间里各持一说，无奇不有。以往那些“笑谈”、“谬论”我们不必列举。时至今日，人类已经登上月球，探测火星、金星等行星，而对于自己所生活、寄居的地球，可以说仍然知之甚少。地球正在膨胀还是正在收缩，新的冰河期是否又快来临，为什么会发生冰河时期，地壳的构造、运动到底怎样，日本列岛沉没论有根据吗？等等，数不清的问题，无不各种学说对峙，莫衷一是。恩格斯说，科学史就是把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过份矜夸自然科学的精密等等，远不符合它发展的客观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崇高威信，迫使它的反对者也打起自己的旗号进行活动，从而颠倒黑白。例如“四人帮”从中国上下两千多年的历史，找出孔丘、秦始皇、刘邦、吕雉等几十个人物和大大小小的事件，把整部中国历史，篡改成一部“儒法斗争”史，宣传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但他们说这不是封建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坏蛋都喜欢穿上‘红’衣服”。“四人帮”就是这种穿上“红”衣服，戴上“红”帽子的坏蛋。如果拿这一类的情况为根据，对“乔装者”和马克

思主义者不加辨别，由此便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成其为一门科学，这就像把江湖炼金术士和韦勒、门捷列夫、奥斯特瓦尔德等化学大师一样看待，至少是找错人了，碰巧地挑中了自己的交谈者。

大凡一门科学，必有其特征。那就是一，物质性，二，客观性，三，有规律可寻。马克思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鲜明地表现了这些基本特征。这个规律对于历史科学的意义，被恩格斯看做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①。我们必须指出，社会历史的研究与天文、物理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有根本不同的地方。地球围绕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绕地球转，纯属自然界的事物。它本身并没有阶级性。人们要客观地认识它，还要遭到神学、唯心论的种种反对，以至葬身火刑，牺牲生命。奴隶们与剥削阶级、它的英雄人物究竟谁创造历史，如何看待这件事，本身就可以成为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客观地认识它，马上就碰到剥削阶级的利益所产生的偏见。因此，社会历史的研究比自然科学研究加倍困难。神学、唯心论把偏见和迷信当做历史，唯物论则要从历史上来说明偏见和迷信，从科学上来克服它。而要做到这一点，自然科学甚至也废然兴叹，无能为力。如果自然科学足以担当这个任务，那么，人类历史如何前进，以及前进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就应当早已照数学、物理学的方程式、公式解决了。因为它是人们首先和普遍关心的事情。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到底占有怎样光辉的地位。

常常又有一种说法：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以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历史为依据的。他们没有看到现代的历史发展，也

① 恩格斯：《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5年版，第21卷，第291页。

很少知道东方。我们处在现代，研究东方，研究中国的历史，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未免不分时间、地点，违反科学精神。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过时了。

马克思主义著作上有些话是大家熟知的。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西方与东方，欧洲与亚洲，以及东方每个国家、民族，它们的历史各有特点。即使邻近的国家、民族，同一个时间里发生的事件，也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地主阶级发起洋务运动，日本则发生明治维新。它们走着相反的道路。二十世纪初，波斯、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纷纷兴起民族解放斗争，但没有一个国家的解放斗争与中国辛亥革命的面貌相同。研究中国近代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简单地把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欧洲历史的一般情形生搬硬套，照样描述中国情况，毫无共同之处。比猫画虎，历史固然面目全非了，马克思主义也成了僵死的、没有人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能由此反过来断定，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已经过时，没有指导意义了。那可以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到头来站不住脚。

马克思主义决非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研究了十九世纪欧洲社会、历史的结果。马克思的学说是十九世纪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直接继续，同时，又是批判地审查过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以后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例如恩格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提供的事实所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写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作为《资本论》续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国家与革命》等，它们立论的根据、著述的时间，或者远远越出欧洲，或者进到了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我们说马克思主